

新芽沙龙·第一期

我们眼中的“一带一路”（The BRI through Our Eyes）

2018年12月16日

2013年，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热烈反响。经过五年的发展，该倡议的一些举措已经生根发芽，并且给古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和地区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举办以“我们眼中的‘一带一路’”为主题的新芽沙龙。沙龙邀请来自美国、英国、西班牙、保加利亚、匈牙利、马拉维、埃及、尼泊尔、乌兹别克斯坦等十多个国家的学生进行主题发言，分享自己国家以及他们个人对于“一带一路”的看法。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对话与交流是学术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新芽沙龙就是为年轻一代学生和学者提供表达观点与交换意见的平台。“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大家来说并不陌生，但“一带一路”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这项重大倡议对各个地区的人们来说有哪些特殊意义，该倡议又为世界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与作用，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本次讨论的要旨。

燕京学堂副院长莫大伟教授（David Moser）对与会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本次讨论会是新芽沙龙的首秀，之后每学期还将继续举办四至五场沙龙活动。本次沙龙所讨论的主题“一带一路”是一个不断演进变化的概念，这体现在其名称变化、范围变迁和进程演进等方面。由此而言，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所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理念依然延续至今，贯穿于“一带一路”倡议之中。本次沙龙对于所有年轻学者而言是一次极佳的锻炼机会，也为日后参加学术会议奠定了良好基础。

来自英国的 Ankur Shah 分享了他关于中国如何能够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的看法。

2017年，Ankur 和来自三所不同大学的3名朋友，在威尼斯开启了为期4个月的自驾之旅。在跨越23000公里的旅程中，他游历了1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他从意大利出发，途经巴尔干半岛、土耳其，通过高加索到伊朗，并踏足

中亚五国，最终到达中国北京。在此过程中，他遇见了很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并且记录下沿途的“一带一路”进展情况。

Ankur 发现，目前在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存在很多概念混淆的问题。即便大家共聚一堂来讨论“一带一路”，但鲜有人对这一倡议有清楚的认知。在 2013 年被提出之初，它被称作“丝绸之路经济带”，而如今其名称已改为“一带一路”。此外，在“一带一路”的政府网站 (yidaiyilu.gov.cn) 上，有一份关于“一带一路”的官方文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了中国对于“一带一路”的愿景。然而这份文件的问题在于，它发布于 2015 年，但随后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些叫法或情况发生了改变，因此该文件中有许多需要更新的地方。其次，该文件在阐述“一带一路”时使用的语言十分宽泛和模糊。虽然宽泛的定义能包容“一带一路”实践的不同形态，但模糊性也使得人们对“一带一路”的精准内涵难以把握。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中俄民众间的约会也被某些媒体视为“一带一路”成功的体现。

Ankur 列举了他认为“一带一路”还需要提升的几个方面。首先，需要更好地打造“基础设施优先”项目，这一类项目通常以简单的方式表述为“想致富，先修路”。一个例子是于三年前开始修建的连接巴库与第比利斯和卡尔斯的铁路项目 (BTK)。预计到 2034 年，该项目将会使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之间的货物运输量翻一番，这将极大促成该地区成为欧亚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心。其次，“一带一路”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项目信息数据库。例如，在黑山期间，他花了几天时间寻找南北高速公路项目 (Bar-Boljare) 却未果，他认为项目日期可能是错的，因为当时这条公路并没有进行施工。因此，如果能够建立一个详实的数据库 (附有地图标明某个项目实施的地址和时间)，“一带一路”的推进将会受益匪浅。第三，应该为一些项目提供更详细可靠的标识及说明。例如他在伊斯法罕并没有见到之前提出实施的德黑兰-库姆-伊斯法罕高速铁路项目，他认为需要提高信息的透明度，用于解释为什么某些项目被推迟，每个项目花费了多少钱，以及新的工期的具体信息。

总之，Ankur 对于“一带一路”的建议有三点。一是应对“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范围引入更严格的标准，比如中俄人民通婚状况是否应成为评估“一带一路”合作成果的标准？二是应该有更精确的项目基本数据，例如运用地图、全球

定位系统，使人们能够看到具体项目的实施进程。三是应更加强调透明度。上述建议将使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一带一路”整体规划与具体项目，特别是从西方的角度来看，项目信息越精确、越具体，“一带一路”就越有可能被视为机遇，而不是威胁。

来自尼泊尔的 Asmod Karki 以新闻媒体为切入点，表达了他对“一带一路”的理解。他指出，媒体是当今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但媒体的报道通常只陈述事件，却并不探究其原因。因此，像理解所有事情一样，要理解“一带一路”，就需要观察者立足现象，深究原因。

Asmod 以尼泊尔为例，讲述了布达甘达基水电站（Budhi Gandaki）这个“一带一路”项目在该国不断推进的历程。该水电项目价值 25 亿美元，预计装机容量为 1200 兆瓦，是位于尼泊尔布达甘达基河上的中西部开发地区的一个储存型项目。2017 年 5 月，尼泊尔政府决定将这个项目交与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建设。当年 9 月，尼泊尔农业、水资源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两个内阁委员会建议政府取消对葛洲坝集团的合同授予，随后的 11 月，尼泊尔政府撤销了该合同。然而，2018 年 9 月，葛洲坝集团再次收到了尼泊尔政府的项目合同邀约。

Asmod 展示了中国和尼泊尔两国媒体对该事件变化的反应。当该项目于 2017 年 5 月首次交与葛洲坝集团时，有中国媒体报道称“这是中国公司的胜利”，而尼泊尔媒体则称“尼泊尔政府决定接受欺凌项目”。当这笔交易在 2017 年 9 月被取消时，中国媒体的反应是“尼泊尔方的取消不会影响中尼关系”。而当尼泊尔政府再次将项目交与葛洲坝集团时，又引发了两国媒体的关注。除了陈述事件经过，媒体并没有报道事件变化背后的缘由。实际上，发生一系列转变的原因是尼泊尔在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9 月间更换了三届政府，政府的更替给与中国合作的项目带来了变数。

Asmod 认为，如果希望通过媒体更深入地了解有关“一带一路”的信息，就需要对相关报道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分析，比较不同媒体的报道，同时关注那些表面上似乎与“一带一路”无关的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在没有掌握充足信息的时候不要仓促地对某件事下结论。

来自马拉维的 Donasius Pathera 的发言聚焦于所谓的“一带一路”恐惧症。Donasius 曾撰写过两篇论文，其中一篇名为《“一带一路”：半梦半醒间？》，该

文章指出，“一带一路”的设想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实践，因此许多想法仍不够明晰。另一篇论文则是基于他在开普敦大学的演讲而展开，讲述因信息不够透明从而导致其他国家对于“一带一路”所产生的恐惧。

Donasius 分析了不同地区对“一带一路”的恐惧，并探讨了缓解这些恐惧的可能途径。他指出，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担忧源于对中国成为该区域的超级大国的惧怕，也有对中国通过提出该倡议从而获得相对更多的利益的担心。而对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来说，他们的恐惧基于这样一种感知，即“一带一路”是中国建立“霸权”的一种战略博弈。

对于产生这种误解的深层原因，Donasius 认为，第一，很多专家已经指出，英语世界中关于“一带一路”的信息并不详细，更确切地说，有关“一带一路”的大部分具体信息都没有英文版本。第二，“一带一路”没有设置具体的办公机构，能够提供更多关于其推进的信息，尤其是中国各驻外使馆没有提供这样的信息。而通常情况下，大多数国家的普通民众会向大使馆寻求信息咨询。此外，非洲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期望之一，是希望有一定程度的透明度，这也被视为任何倡议或项目的关键部分，也是监测和预防腐败的重要举措。

Donasius 总结称，如果不进行信息投入，也不为相关沿线国家提供获取详细信息的渠道，就有可能因此产生对“一带一路”的误解，进而阻碍项目的顺利实施。即便“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提出了五年，但非洲人对“一带一路”的理解仍然非常模糊。为此，中方应加大信息投入，让人们了解项目实施的进程，转变媒体报道的负面势头。另外，中国可以鼓励学者对“一带一路”进行研究，将相关学术成果向大众公开。在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信息的同时，获取国际社会的反馈。

来自中国的梁坤围绕丝绸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作主题发言。她介绍了丝绸的历史，并回答了“新丝绸之路”中“新”的内涵，以及丝绸和文化多样性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问题。

据了解，丝绸虽然由中国人发明，但在历史上却作为外交礼物和商品被引入到不同的国家。丝绸流入罗马和波斯后，被当地人按照其传统改进成具有不同特色的产品。对丝绸的拆解与改进实际上展示了一个文化互动的过程，即源自中国的物品是如何受到世界的欢迎，并在与当地文化的互动中成为新的产品。而丝绸只是这种文化和经济成功互动的例子之一。

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方之间的地理纽带，也是一条可供东西方交流思想和智慧的道路。在这种互动形式下，人类文明能够变得更为丰富。尽管古代丝绸之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最终消失，但中国在 2013 年提出的共建东西之间新经济走廊的倡议，再次促使人们回顾历史中的区域开放与合作的经验。地区合作的历史经验表明，仅凭一个国家的一己之力不可能有长远的成就，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独特性，可以和其他国家相互补充。正如习近平主席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是“一带一路”的精髓。中国只是“一带一路”的发起者，但是所有参与者都可以从中受益，获得创新的机会。各参与方也能从古代丝绸之路中获得关于多样性如何促进文明发展的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一带一路”在过去的几年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它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缺乏透明度、信息缺失等。因此必须清楚地看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多样性的世界中，而“一带一路”对这些多样性是持开放态度的，然而，如何使这些差异变得更有利于文明的相互促进，并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创新，仍需要对相关的问题进一步的探讨。

来自保加利亚的 Kaloyan Geogiev 和 Davor Berov 的发言聚焦保加利亚在中国与中东欧合作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保加利亚如何支持“一带一路”以实现互联互通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目前，欧洲正处在十字路口，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价值正饱受争议。反建制运动在欧洲有许多不同“色彩”的力量和代表，但他们都促使传统政治精英对当前问题提出不同的政策，而这些政策有可能给欧洲的未来指出不同的方向，比如通过多种手段促进新经济的政策。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欧洲和保加利亚都处于相似的动荡期：脆弱的经济增长导致了日益明显的不平等，动摇了曾经的团结基础。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虽然保加利亚已成为欧盟成员国 10 年有余，但其国内工资最低仍只有每月 200 美元，这也反映出新自由主义共识下的欧盟并未能达到人民的期望，使他们感到满足，取而代之的是在各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内部滋生的强烈挫败感。同时，一体化未能弥合欧洲“富裕的西欧”与“贫穷的东欧”之间的经济差距，这也使得那些有危机感的国家只剩下一种选择，即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与合作机遇。

虽然有人对“一带一路”提出了涉及合法性、沟通及效率方面的疑问，但毋

庸置疑，“一带一路”是关于对未来的展望。尽管“一带一路”的设想被一些人认为有些抽象或模糊，但其提出的理念和实施计划却恰恰是目前的欧盟所缺乏的。2018年早些时候，欧盟委员会发布的白皮书显示，欧盟高层对于欧洲未来的发展设想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只有一项目标涉及鼓励开展更深层次的改革，对欧洲的概念及欧盟未来该走向何方进行深入思考。

对于像保加利亚这样的欧盟和北约成员国来说，与中国成功的双边合作可以带来巨大利益，比如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为普通劳动人民和社会各阶层提供切实的物质利益。正如保加利亚前外交部长所说，如果保加利亚能够每年向每一个中国人出售一盒火柴，一罐酸奶，一滴保加利亚玫瑰油，这将为保加利亚的经济发展带来全新动力。考虑到保加利亚的战略地缘位置及保中两国的传统友谊，保加利亚可以成为连接欧洲和亚洲、欧盟和中国的桥梁。

事实上，中欧关系不一定会成为零和博弈关系。鉴于美国采取孤立保护主义的新立场，欧洲可以与中国走得更近。但同时，欧洲与中国双方也都应做出一定的让步：中国将不得不更加注重依据市场规则采取行动，欧盟也必须允许某些成员国根据其国内条件追求自己的政治诉求。从2018年10月在保加利亚举行的中国—中东欧“16+1”领导人会晤来看，欧洲和中国之间存在着多种灵活的合作方式，未来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建立双赢局面。欧盟委员会应当找到一种方法，将其外交政策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整合，而不是如现在所做的那样只是增加警告。欧盟应该寻求参与欧亚大陆联合项目的方式，特别是在环境友好、金融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找到与拥有大量资源和雄心的中国进行合作的路径，而不是简单地反对。欧盟应该像水流一样，变化灵活，消除恐惧，为合作共赢营造更广阔的空间。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 Kakhrom Abdukadirov 介绍了他的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看法。他认为，中亚拥有良好的运输能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与中亚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双边和多边如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渠道进行互动，而“一带一路”也恰恰是通过上述平台和渠道进行沟通协调。目前，中国已与中亚各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伙伴关系，由8个国家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协调相关国家间的“一带一路”的合作，成为推动地区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

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中部，同时也是欧亚大陆的中部。自汉代以来，拥有

丰富自然资源的乌兹别克斯坦就与中国保持着长期的良好关系。乌兹别克斯坦是最早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并认为这项计划对于欧亚大陆具有特殊的意义。目前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正在就中吉乌铁路项目开展合作，该条铁路被认为是中亚地区一项前景广阔的项目。铁路建成后，将使原先通过该地区的运输时间缩短一半，每年可减少运输成本 100 亿美元。此外，该条铁路还有望继续向非洲与欧洲推进。

目前，“一带一路”在中亚地区仍面临一些挑战，“恐华”论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仍有市场。债务危机也令一些国家产生忧虑，比如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外债中有较大一部分来自中国投资。此外，中亚一些地方政治局势的紧张，中国公司希望通过贿赂的方式赢得当地的项目合同，地区外部力量对相关合作开展产生的负面影响，都是令人无法忽视的问题。

Abdukadirov 认为，考虑到国家的规模和人口密度，中国必须在对外合作方面更加主动。并且，中国目前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无论其外汇储备有多高，拥有多么先进的技术和廉价的劳动力，中国都需要其他国家更有意愿和能力进口其生产的产品。

来自西班牙的 Jose Rodriguez 探讨的问题是欧洲在哪些方面可以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他认为，2008 年以来，经济危机、债务危机、英国脱欧和难民危机等一系列事件使欧盟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基于此，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新型大国关系格局开始朝着 G2 的方向转变，中美两国将共同承担更多的责任。然而，这种表述会将中国置于一种质疑之中，即中国会成为潜在霸权，在国际社会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是为了最大化其利益。另一种观点则视中国正进入“新常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正试图推动多极化的国际秩序，而欧盟则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正确看待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将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一带一路”倡议。

欧洲是世界上最大、最发达的市场之一，也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欧中已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截至 2017 年，中国已有 20 多条铁路通向欧洲，中国和欧洲城市之间的运输路线超过 15 条。在 2015 年举行的第 10 届亚欧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就强调有必要深化中欧之间的互联互通，改善贸易和投资，以加速建立单一市场和单一的基础设施联通网络。2015 年，中欧双方决定将欧洲投资银行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作为中欧战略议程的一部分。一系列战略议程将

推动双边贸易，有助于双方贸易额在 2020 年之前实现 1 万亿美元的目标。近年来，得益于道路联通，中欧贸易量出现大幅增长，有力推动了“一带一路”相关经贸合作。

在金融领域，自债务危机以来，中国一直向欧洲提供相关支持，而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的投资无疑是一种新的融资渠道，有助于欧洲加强金融安全。亚投行目前正在许多欧洲国家联合运作，其中许多国家还是其创始成员。自成立以来，亚投行还与欧洲投资银行和其他欧洲银行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另外，自 2015 年以来，中国持续给予欧洲投资银行以支持，从而成为第一个宣布对该计划承诺的非欧洲国家。

不能忽视的是，“一带一路”在欧洲也面临着不少挑战。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是分裂和分散欧洲的战略，且中欧双方投资存在经贸摩擦的潜在风险。但应看到，欧盟目前正在呼吁增加互惠性的合作，且欧洲目前正处于一段经济投资的恐惧时期。作为世界政治重要的一极以及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欧洲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多极世界格局的稳定有重要意义。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和欧盟有必要加强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来自中国的曹梦瑶以“和谐与多元：当今时代的‘一带一路’”为主题进行了阐述。尽管过去 5 年中国在国内经济发展及推进“一带一路”方面成就瞩目，但仍有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启动“一带一路”倡议如此重要，为什么这么多国家间的设施联通、政策协调、金融整合、人与人紧密相连这么重要。她认为，“如果要寻求繁荣，就要建立互联互通”。这里的互联互通性可以翻译为“Guanxi”，也就是中文关系的意思。中国人常常认为关系非常重要。只有建立了牢固的关系，人们相互间才能从彼此的比较优势中获益。这就是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共建“一带一路”是可能的？曹梦瑶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人性固有的本性和中国传统思想。一方面，作为个体的人对于与他人交流并建立联系有先天的需求。全球由七大洲和五大洋组成，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具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及各自优势，走到一起相互交往成为个体发展自我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君子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内容。正是有了这种思想，中国自汉代起就开通了与中亚地区、阿拉伯世界联通的古丝绸之路。如今，除了“一带一

路”，中国还发起并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上合组织（SCO）、亚投行（AIIB）等国际组织和机构。未来，“一带一路”将在中国的推动及周边国家共同努力下实现进一步的扩展。

来自匈牙利的 Peter Sczigel 探讨了“一带一路”的政治溢出效应，他的发言聚焦于“一带一路”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全以及欧洲一体化的影响。他认为，“一带一路”构想恰好涵盖了欧亚大陆上的众多贸易路线，因此如果“一带一路”推进顺利，它将对相关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欧亚大陆产生重大积极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在政治层面上或许存在双重意义：如何理解“一带一路”构想，以及如何通过“一带一路”理解中国在新时期的发展理念。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的起点在于开放的理念，这一理念由邓小平提出。加入 WTO 后，这一理念在中国一直延续并不断加强。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开放则意味着中国将与所有沿线国家及世界其他国家加强经济联系。尽管如此，目前国际上仍存在一些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意图的不同理解。中国对此一直强调，中国永不追求霸权，中国是“一带一路”的主要协调者，这一构想将会推进世界一体化与国际和平，进而使所有欧亚国家受益而非面临威胁。然而，一些西方国家还是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追求全球霸权的工具，并对此感到担忧。

罗伯特·吉尔平的全球霸权理论认为，当存在一个全球霸权时，国际秩序就会趋向稳定。此处的霸权，是指一个在军事、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都优越于其他国家，并且基本上能够统治世界，保持国际环境稳定的国家。但是只要霸权发生变动或转移，战争爆发的风险就会扩大。因此，在美国的决策者看来，美国应该阻止中国夺取全球霸权地位，以维持国际秩序的稳定。然而，现实却截然相反，中国无意追求霸权地位，而是试图推动建构多极化的世界，以推进全球一体化。

Peter 认为，中国推动构建多极化世界的目标能否达成，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对此的反映。目前美国面临三种选择，一是采取遏制战略，即将中国限制在其所在的半球之内，这就需要美国加强同日、韩等地区盟友的关系，同时要在一些地区及国际组织内增强自身力量，以压制中国。二是选择接触战略，即在 WTO 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框架中与中国进行接触，并视中国为全球伙伴。这一选项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三是选择中间道路，即“遏制加接触”，美国在加强地区存在的同时，将中国作为平等的伙伴进行接触。不过，令人担忧的是，特朗

普政府所展现出的姿态很大程度上表明其极有可能在国际政治中对中国采取遏制的举措。对此，中美双方的决策者应通过对话明确“一带一路”的内容，减少因缺少沟通造成的误判与冲突。

欧洲目前对于“一带一路”的政策选择面临三个缺乏。第一是缺乏对“一带一路”统一的认识和理解，导致目前各国间及各国与中国均存在沟通上的问题。欧盟还没有清晰地理解“一带一路”是什么，以及如何参与到这个计划中。第二是成员国之间缺乏“共同利益”。一些国家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寻求来自中国的政治支持，另一些国家则侧重于经济间的合作，这也导致了第三个缺乏，即在中国问题上，欧洲缺乏“共同的计划”。上述问题的解决同样需要中国与欧盟之间以及欧盟内部更多的沟通。

当中国与中东欧一些欧盟新成员国达成“16+1”合作框架，以此构成“一带一路”在欧洲的基础时，在那些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和不与中国接触的国家间，出现了一条明显的界限，有观点认为这一分界与冷战时代的铁幕非常相似。考虑到欧洲目前面临的诸如民粹主义崛起、移民危机、英国脱欧等问题已经使得欧盟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一些人也担忧“一带一路”将会撕裂欧洲。

Peter 认为，欧洲国家应当对未来有一个统一的愿景，并且必须在欧盟层面制定“一带一路”合作的相关规划，因为它能够为中欧提供发展机遇，使双方真正成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参与者。在这个前提下，欧盟所有成员国都有机会从中受益，“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欧盟来说也能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埃及的 Nancy Abdelghany 的发言主题为《“一带一路”——繁荣之路》。在简要介绍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与愿景后，Nancy 阐述了埃及对于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比较优势。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一方面持续推进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始终将埃及视为能够在推进其与阿拉伯及非洲国家关系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地区性强国。对于埃及而言，2014年12月塞西总统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埃及的外交政策导向在持续了几十年以美国为中心之后发生了重大转变。此外，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一直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也受到了埃及决策者的欢迎。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拥有印度洋和地中海中转枢纽的战略位置，埃及在过去几年中已成为新海上

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节点。

在上述背景下，埃及有机会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中东地区和非洲的“中心国家”。有分析认为，埃及已经成为未来 5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最具商业合作潜力的国家之一，而中埃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层级，也为双方建立新的商业关系提供了政治基础。

Nancy 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通过开放贸易使所有参与其中的国家变得更好。它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可以通过市场间的联通创造无形利益，实现地区乃至世界和平。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中国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并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但同时，这一倡议也面临挑战，比如有时在规划合作框架时会忽视一些非洲欠发达国家的复杂性。相较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这些国家对于完善的教育和卫生体系需求度更高。此外，一些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并不稳定，也有可能增加“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加强可行性研究，向沿线国家进一步阐述清楚“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与意义。

Nancy 认为，亚太经合组织、东盟、非洲联盟和欧盟等各机构通过对政策与发展目标进行协调，将使欠发达国家受益。与此同时，将中国的资本、技术、市场、企业、人才、丰富的发展经验与非洲丰富的资源、巨大的人口红利和市场潜力相结合，也将有很大的机会创造另一个发展奇迹。同时她建议，基础设施项目应符合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并需要一个清晰的愿景以应对气候变化。由于印度和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持不同观点，因此中国在推进这一倡议时应以明确的目标回应这些观点，同时以更深入详细的可行性研究避免产生诸如“一带一路”究竟会带来合作共赢还是冲突之类的问题。

来自美国的 Allison Lapehn 通过对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的案例研究，阐述了她对“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一些项目推迟的看法。

Allison 指出，近年来西方媒体和世界某些地区的部分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发出了一些评论“噪音”，他们主要的关注点在那些“失败”的项目上，提出了片面的观点。这些评论从中国的发展前景出发，着重探讨了债务陷阱和项目失败现象，将中国塑造成一个不负责任的“放贷者”，认为中国漠视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故意使项目推迟或失败。上述观点主要来自于“全球发展中心”（美国一家智库）于 2018 年 5 月发布的一份关于“债务陷阱”的研究报告，

其中提到斯里兰卡将汉班托塔港租借给中国 99 年一事。这项研究给每个国家进行了信用评级，分析了在给定信用评级的前提下理想的 GDP 与债务之比，之后通过数字展示这些国家接受来自中国的贷款后其债务发生的变化。

Allison 认为，这篇报告的观点不够全面，因为其只关注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项目合作，并且只关注了中国一个国家。如果研究对象范围更加广泛，不仅有中国，也有合作对象国的视角，那它就应该发现实际上有更多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作用。为此，Allison 的个人研究侧重于较为知名的项目及失败案例，透过对象国的视角，更多地围绕“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对象国国内经济形势和项目融资缺乏透明度等问题。此外，她还研究了对象国政治体制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如何导致相关项目的拖延甚至最终失败。

在这些研究中，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是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中国在这个项目中提供了巨额资金，并且获得了为期 99 年的港口经营租约，这被许多人认为是损害了斯里兰卡的主权。对于这个引人注目的案例，此前并没有关于该项合作是如何开展以及斯里兰卡国内政权的变化是如何导致这一结果的详细分析。

汉班托塔港位于斯里兰卡南端，这里是斯里兰卡前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的家乡。2005 年 11 月任职后，拉贾帕克萨抓紧时间上马了几个大手笔的基础设施项目，旨在振兴家乡经济。2007 年，经过谈判协商，中国进出口银行同意向汉班托塔港第一阶段建设提供 85% 的费用，此后又向汉班托塔港的第二阶段建设工程提供了 9 亿美元的贷款。然而，由于管理不善，无法吸引过往船只停靠港口，汉班托塔港的盈利不足以支付贷款偿还。因此，斯里兰卡于 2017 年 7 月与中国签订了协议，将汉班托塔港的大部分运营管理权转交给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中国满怀善意地提供资金，帮助斯里兰卡修建港口，却被一些西方媒体指称为给斯里兰卡带来了负担，汉班托塔港也成为常被挂在嘴边的“一带一路”倡议下“债务陷阱”的典型例子。

Allison 表示，该项目在透明度方面存在一些不足，由此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引发了人们对政府内部是否可能存在腐败的争论。比如在 2011 年，当工人们疏浚土地，然后将其淹没，以形成内港时，他们没有考虑到有一块巨石部分堵住了港口的入口，导致油轮等大型船只无法进入，而大型船只是该港口的商业基础，有可能会导导致港口本身的盈利能力达不到预期，于是港口方面向一家中国公

司支付了 4000 万美元用于清除这些巨石。然而，当斯里兰卡本地媒体得知清除巨石竟花费了 4000 万美元后，其所发布的报道令每个人都开始指责政府，并且认定这当中肯定有腐败现象存在。因此，如果有一份公开透明的财务文件表明每笔费用的用途以及港口建设费用的整体规划，斯里兰卡与中国双方都能够避免被认为与腐败有牵连，中国也可以避免因投资而陷入所引发的争议中。

2015 年大选后，斯里兰卡政权更迭。此后，一些评论将其国内问题与中国挂钩，视中国为与腐败相关的角色，而非投资者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者。在拉贾帕克萨执政时期，斯里兰卡与中国的关系非常紧密，而当西里塞纳当选总统后，很多人都预测斯里兰卡将更多地转向印度，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2018 年 10 月，现任总统西里塞纳跳过议会，任命前总统拉贾帕克萨出任新一任总理，然而，斯最高法院和议会都坚决拒绝接受这一做法。有分析认为，这一事件体现出斯里兰卡民主体制的力量。但目前来看，斯里兰卡未来的政局走向还有待观察。近期针对新一次选举的民意调查显示，拉贾帕克萨可能会再次当选总统。有分析称，如果当选，他将与中国进行更深入的接触。

Allison 强调，“一带一路”的成败事关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发展与繁荣，因此每个人都应为“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助力。一方面，许多沿线国家对基础设施有真切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也有责任实现更健康的 GDP 与债务比，坚持透明度准则。这有助于沿线国家的发展与稳定，也是从整体上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作出的贡献。

中国学生唐晓周就“一带一路”对于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据她介绍，自 2016 起，中国虽然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国，但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却仅占全球总产量的 4.6%和 3.9%。与此同时，中国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量却占全球总量的 13.1%和 5.9%。需要进口能源的国家总是被认为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其他一些国家对其实行了封锁，这些国家就将面临能源中断的危机。中国的煤炭和天然气的产量可以涵盖其大部分消费，但涉及到对石油的需求时，情况就有所不同。

中国自 1993 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能源安全特别是石油供应安全已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重大问题。二十多年来中国也一直在努力找出解决对进口依赖的办法。中国 80%的进口原油运输都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因此，如果这个通道

被敌对国家封锁，中国就将面临石油供应中断的危机。这也是所谓的“马六甲困局”。具体而言，这一困局包括三个方面：运输能力、和平时期的风险（海盗、恐怖主义、事故等）、中国的对手对通过该海峡的能源运输船只实施封锁和禁运。前两种情况不会对中国的能源安全造成重大影响，对于第三种情况则需重点关注。

唐晓周认为，从军事角度分析，有五个因素或将导致第三种情况的出现。一是马六甲海峡距离中国沿海和海军基地太远；二是中国海军缺乏战时执行远程任务的经验；三是中国的补给舰船不足以支持远距离任务；四是中国海军的舰船很容易在目标进入射程之前就被对方发现；五是虽然中国军队可以用反舰巡航导弹攻击封锁船只，但极易受到地对空导弹、陆基战斗机和航母舰载机的攻击。

基于上述情况，推进“一带一路”对中国开拓其他石油运输线路就显得极为重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已经与相关国家在能源方面展开了合作，其中包括中缅油气管道项目、中国与巴基斯坦合作的瓜达尔港项目，以及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深水补给码头项目。前两个项目能够帮助中国绕过马六甲海峡，通过缅甸和巴基斯坦经波斯湾抵达目的地，最后一个项目通过扩建马六甲港口，提升中国在马六甲海峡的角色，有助于在海峡港口建立可靠的船坞。尽管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项目合作不能完全取代马六甲海峡在中国能源安全中的作用，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的合作，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增加多元化的石油进口渠道为中国的能源安全提供保障。

莫大伟教授（David Moser）在闭幕总结中感谢了参加此次沙龙的所有发言者。他建议今后应继续举办此类沙龙，让各国学生有更多机会表达想法、相互交流。他注意到，许多发言人都谈到了“什么是‘一带一路’”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有时不善于向外界传达信息。尽管“一带一路”事实上是一项好政策，但可能是由于不恰当的推广方式，这一政策让一些人产生了误解。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的对外宣传更像是政治宣传，而外国媒体一般很难接受这种宣传方式和内容，这是值得中国注意的问题。另一方面的问题在于持负面态度的新闻媒体。莫大伟认为这是一种媒体霸权。西方的媒体尤其是美、英一些媒体试图控制叙事权，特别是有关中国的问题。这使得有时候中国的官方媒体也会依赖于西方媒体，借用西方媒体的解释，而不是提出自己的观点。他希望与会的有识之士能够走出国门，打破这种针对中国的专横的信息控制。

当前，全球格局正面临着深刻变革，传统的美国霸权正在衰落，中国正日益崛起，多极化格局已经形成。“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努力推进这种转变的关键举措之一。各国需要认识到全球格局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与中国发展关系带来的利与弊，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本国的最佳选择。

新芽沙龙·第二期

略谈丝绸之路与区域研究

2019年3月8日

近年来，丝绸之路研究已在国内成为显学，在国际上也日益受到重视。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主题为“丝绸之路与区域研究”的新芽沙龙，邀请国际知名科学家、教育家，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教授与学生交流。张教授回顾了欧洲早年的“东方学”以及美国20世纪后期的“区域研究”，批判性地检视其经验和绩效，并结合自身行走丝路的长期观察和体认，分享对学术前沿发展的理解和思考。

张信刚教授首先介绍了他眼中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听上去像是一条笔直的或者单一的一条路，实际上它包括四个不同的交通通道。

第一个交通通道是欧亚大陆北方寒带的人们所使用的。欧亚大陆最北是北极，以此往南是无法居住的冻土区和难以通行的森林区，再往南是宽度达两百公里、东起大兴安岭西至乌克兰黑海北岸的大草原。草原上只有灌木和草丛，少有崇山峻岭，人类早期的往来可能就是从使用这条草原之路开始的。从草原再向南，进入纬度低一些的温带，这里温度和降雨量都较高，适宜人们定居和种植。在这里有一条绿洲之路，连接着陆地和沙漠之间的诸多城市。今天人们所说的丝绸之路基本上就是指这条路，也即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除了东西之间的交往，南北间交往也促成了交通网络。比如居住在温带和热带的人之间的往来，包括从中国关东地区到云贵川地区再向缅甸、孟加拉延伸的南方丝绸之路，三国时代孔明七擒孟获走的就是这条路。早期近海的人们往来通常使用船只，由此形成了靠近沿海线的丝绸之路。公元前三世纪左右，亚历山大之后的埃及被希腊人控制，希腊人发现可以从红海进入印度洋，并且发现印度洋的风有半年是从南向北吹，有半年是从北向南吹，这就是季风，也被称为“贸易之风”。此后，海上的交往就不再局限于沿海岸线的船只往来，而是借助季风通过海上之路前往更远的地区。草原之路、绿洲之路、南方之路和海上之路共同构成了丝绸之路的交通网络。

公元前一世纪，西汉的张骞从长安走到今天的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一带，

汉夷文化交往频繁，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700年后，玄奘西行，进一步提升了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再过700年，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从家出发前往麦加朝圣，途经44个国家，旅途长达75000英里。玄奘和伊本·白图泰两人回国后都将旅途所见记录下来，分别命名为《大唐西域记》和《伊本·白图泰游记》，两本书为后人了解丝绸之路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信刚教授表示，区域研究产生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其向前追溯应该叫做东方学，我们今天对世界史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欧洲近两百年来在东方学领域的研究，主要有六个方面成就。

一是埃及学的建立。虽然一定程度上罗塞塔石碑的发现存在偶然性，但欧洲学者结合对古希腊文的研究，经过20多年的努力将其破解，为之后的埃及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是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探索。最早的文字及最早的城邦集团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间即今天伊拉克所处的地区出现的，比埃及略早了几百年。后人通过破译美索不达米亚3万多块象形文字谜板，对当时的宗教信仰、天文研究及部族政治关系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这些知识也成为了东方学的主要成就。

三是对印欧语系的探究。英国强大后以东印度公司的形式占领了印度的若干重要地区，与当地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协定，并派法官依据协定审理案件。其中一位精通多门语言的法官詹姆斯对梵文很感兴趣，通过研究他提出了“原始印欧语”的假说，认为人类语言有共同的源头。此后经过200多年语言学家的研究，假说中的一些内容已经得到广泛认同，比如梵文的文法以及名词的位和格都与欧洲语言相似，与此同时印欧语系的谱系图也日渐完善和清晰。

四是印度河谷文明的发现。20世纪英国与德国的考古学家在印度河谷发现了街道、房屋甚至艺术品等城市印迹。尽管这些遗迹的创造者不得而知，但不可否认在距今5000年前至3500年前，印度河谷曾有过相当发达的文明，该文明甚至比雅利安人建立婆罗门教后所形成的印度文明更早。如果进行排序，两河流域文明是最早出现的，距今6000年，上下埃及统一产生的埃及文明距今约5500年，印度河谷文明距今约5000年，有实物证明的华夏文明距今约4000年，可以看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由西向东的。这些文明是相传发展还是各自发展很断定，但有一点可以明确，这些文明产生后它们之间来往的历史逐渐为人所知。交往的

原因各有不同，有的为了贸易，有的为了迁徙，有的为了征服，而征服后贸易更发达，钱就更多，于是部落变成国家，国家变成帝国的现象非常多，这也是东方学研究带给后人的体悟。

五是草原帝国的发现。马被驯服大致发生在今天的黑海北岸，是生活在当地的草原帝国的人们为了利用草原之路所做出的举动。有研究表明，草原帝国曾经制造出很多精致的金属装饰和战争武器，而他们的后人就是今天生活在图瓦共和国的斯基泰人，他们使用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

六是丝绸之路的重现。虽然丝绸之路被公认为曾经存在，但与之相关的系统性发现却不多。曾有德国考古学家在楼兰地下发现一具保存非常完好的古尸，有艺术家用绘画将其面部复原，从面部可以看出属于吐火罗人，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欧罗巴人种，非蒙古人种。大英博物馆中有一封曾在长城的烽燧底下发现的粟特人于晋朝初年写的信，经过破解粟特文，得知是这名粟特人在八王之乱时向家中报平安的家书，也反映出粟特人曾在丝绸之路上生活的内容。此外，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也记载了基督教是唐朝从伊朗传入中国的。

尽管东方学的贡献巨大，但在 20 世纪中叶美国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后在与其他国家交往时发现，很多领域都缺乏相关人才。为此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与美国多所知名大学共同创建了区域研究学科，致力于培养一批对某个地区的风俗、民情、法律制度、社会状态等都有所了解却并不精通某一领域的人才。尽管这种培养理念最初不被一些学校所接受，但随着时代发展，区域研究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

有人认为，区域研究培养出的人才样样通却样样松。对此张信刚教授指出，这样评价并不科学，但对从事区域研究的人来说，也应像王维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样，在知识的光谱中，要有一门知识是非常精通的，同时对其他相关知识也要了解，即“you know everything of something, and you 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区域研究的角度是非常广的，研究方式也是多样的。比如分析中国、印度、伊朗经历的现代化过程以及三者各自的文化特质。中国可以被视为一个持续的文明体，它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一个帝国。从《左传》、《春秋》等一直到儒道佛的信仰，不管处于什么政权管理下，这个文明体几千年来都是存在于长江、

黄河、珠江流域这片土地上的，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印度可以被看作是多次脱胎却没有转变基因的宗教社会，印度生活每一方面都脱离不了宗教，印度人的宗教情结也非常强。伊朗与前两者又不同。波斯一直都是亚洲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东边，它很快学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与中国相似，波斯有农牧二元性，游牧生活与农业生活共同存在于其文化中，但其主要特色是一个心智的帝国，其对人类思想的影响非常大。比如琐罗亚斯德宇宙观、马兹达宗教、太阳神米特拉崇拜、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拜火教）、景教（基督教东方教会）等对世界宗教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公元 650 年之前伊斯兰教没有真正进入波斯，但 650 年后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大军消灭，波斯人全部改信伊斯兰教。今天有约 98% 的伊朗人信伊斯兰教，然而，伊斯兰文明中涉及数学、天文学、化学、医学等科学著作虽然是用阿拉伯文写作的，但作者的家庭背景却都是波斯人，阿拉伯世界很多的制度也都是波斯的延续。可以说阿拉伯人从宗教上同化了波斯人，但波斯人却从制度和思想上同化了阿拉伯人。

对于学术价值与功利主义的关系，张信刚教授认为，如同历史上很多东方学者一样，今天中国的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既有服务于某个目的的需要，也是出于自己对学术的热爱和对真、善的追求。正如《尚书》中所说，“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如果只是将区域研究作为一个惟目的性的学术手段，而不去追求真正的真、善、美，那结果很可能是学术没有追求到，目的最终也没有达成。

以法国为例，法国最早的大学是索邦学院，其建立是为教会服务的。弗兰西斯一世时，欧洲文艺复兴肇始。弗兰西斯一世认为学院太过功利主义，只为教会服务而不是真正做学术，因此他在索邦学院附近新建了法兰西学院，鼓励学术研究的创造性。此后，欧洲人的科学探索及创造进入了鼎盛时期：15 世纪的天体论、解剖学；16 世纪的双栏记账法；17 世纪的万有引力和微积分；18 世纪的细胞学、生理学、蒸汽机；19 世纪的进化论、电磁学；20 世纪的量子论、相对论等等。然而同一时期，东亚国家在相关领域的贡献却很少，是因为经济实力不足，还是因为缺乏人才抑或是别的原因？这的确值得从事区域研究的人思考。

张信刚教授表示，在新的时期要重新看待新丝路，从而产生一些新思路。中国既是内陆国家又是海洋国家。中国也是一个除了煤之外能源短缺的国家，需要大量进口能源，这就令中国的能源战略必须兼顾海陆运输和陆路运输的安全性和

可靠性。在海运路线上，尤其是在具有战略地位的地区需要与海洋强国周旋，确保通航的权利。在“大中亚”陆地，中国也需要与相关国家合作互利，让“新丝绸之路”稳定安宁。

针对新丝绸之路与区域研究，张信刚教授最后提出几个思考问题。一是目前国人对于丝绸之路的认识明显不足，相关领域的人才也较为缺乏，推行“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加快人才培养。二是有些被认为是中国“天然伙伴”的国家，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也不足，之所以加入“一带一路”可能是出于某种需要，但同时却又带有一些戒心。三是目前的项目以海港、飞机场、铁路公路、发电厂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但现在中国与世界已经进入了网络经济时代，可以多增加一些与“一带一路”相关的电子商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合作项目。

本期新芽沙龙邀请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四位同学与张信刚教授进行对谈。

胡莉：我将“丝绸之路”在知网进行搜索，大概出来约1万多词条，用区域与国别进行搜索的结果只有90多条，数据对比是非常明显的。通过这种检索来探讨学术意义不是那么强，但可以说明一点，大家对丝绸之路的关注更热、更火、更多，对区域国别特别是国内区域国别的研究关注更少。另外，张先生觉得把丝绸之路和国别研究放在一起讲牵强，我反而觉得这个背后有很深的含义。

今天讲的东方史学，讲了欧洲主要是英帝国时代对于他们认为东方的想象认知和研究，接下来又讲了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对世界进行了一种大规模的、建制性的、有意识的积极主动的学科性研究。北京大学成立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设立了这样一个学科，开展相关研究，就好像历史是一个圆圈，走了一圈后又回到了某一个点上。现在中国是更有意识、更加主动地要去认识世界，曾经欧洲人这样做过，美国人这样做过，现在中国也特别想这样去做，这是我的体会。

张教授讲到原来欧洲人认识世界的时候可能只是直接的接触和简单的交流，比如传教士到中国来，他们观察并记录中国的不同时期，之后再将这些内容传播到欧洲，这是一种先实践后总结的过程。今天我们是从一个学科的角度去研究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情况，研究路径与历史上有很大的差别，得出的结论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以您这样一种既读万卷书又走万里路的经验来看，如何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更好地结合？

张信刚：行和知两个方面都是需要的，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去那么多国家，

也不可能读完所有的资料。美国在开展区域研究后不久，肯尼迪总统提出派遣大量有理想有知识的美国青年去世界各地做服务工作，而不是单纯地研究问题，这和 19 世纪教士出于自愿或受教会派遣到其他地方传教是相类似的。后来他们中的部分人回国后也选择了对相关地区进行区域研究，所以说行和知从来都不是割裂的两个范畴。

钱乘旦：张教授刚才提出的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关于区域与国别研究应该是功利性质的还是学术性质的。我们做研究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是政治的需要去做功利性的，还是说出于理想和兴趣的需要要达成学术的目标，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要把区域与国别研究做好，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带有世俗性或功利性，而是应该有一个非常坚定的学术方向，也只有先将研究做好，才有可能去为某种目标服务。

张信刚：同意钱老师的观点。我用“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个表述，就是说应把握好一个度，这是其一。第二，学术本来就是无止境的，不能说为了某一个固定的目标去做学问，如果只是为了一个固定的目标而去做学问，研究的精神动力都未必会持续存在，更不要说结果了。

卢宇嘉：张教授特别谈到了波斯的文明，称其是心智的文明，教授著作中也曾经指出，什叶派的教义比逊尼派更容易接受甚至更加重视公众议决的法学原则，因此与现代民主没有本质的冲突。请问张教授如何看待目前伊朗特有的政治模式。

张信刚：当然不能说没有意见，但是我对我的意见并不是充满自信。什叶派的理论和实践与基督教更像。从内部看，今天伊朗的政权既是什叶派的精神传统或者法律传统的继承，又是对上一个国王想通过白色革命走西化道路的反对。从外部看，阿拉伯几个国家不赞成它，以色列、美国也不赞成它。即使如此，伊朗已经实行全民普选总统、议会好几届了，虽然被提名的候选人要通过最高宗教团体的认可，但竞选活动还是存在的，这种情况在沙特阿拉伯是不会出现的。

钱乘旦：关于伊朗政权性质问题，这又涉及到民主制度的标准和模式问题。按照很多西方人的想法，民主制度就只有他们的那种形式，尤其在美国人看来，欧洲都没有达到他们那样的民主高度。如果我们这样考虑问题，那如何给目前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贴一个标签？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

张信刚：我会说它是指导下的民主。伊朗最高宗教团体控制着一切，每个部

里都有宗教委员会，每个省竞选省长时都需要委员会批准。民主是有的，但要征得阿亚图拉的同意。我相信他们的民主比波斯湾东岸那几个国家好得多。

丁雨婷：您在著作中提出用流体动力学研究历史的发展，这是具有启发性的。我很好奇您走了这么多的丝路国家，又读了这么多的书，在这个过程中您有哪些独特的研究视角呢？

张信刚：我的总体感觉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人与人之间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性，如果在旅行的过程中只看到共同点，没有看到千差万别、各色各样的文化，那就等于白去了。所以既要看到同一性，又要看到差别性。

吴奇俊：我第一次接触张老师的著作是《大中东行记》，读起来非常流畅。中东国家发展模式是一个热点问题，您认为“大中东地区哪个伊斯兰国家能够涌现出大批独立判断的学者，在大众接受教法范围内找到一条可及的现代化途径，哪个国家就可以成为大中东伊斯兰国家中未来发展的模式”，您将这个模式简化为伊斯兰+民主+科学。我有一个问题，您当时强调的是独立判断的学者，是您认为学者在这个过程中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还是因为本身您是一位学者？此外，现在伊朗、埃及、土耳其被认为最有可能成为中东国家模仿的对象，以您的多年观察，哪个国家更符合这种发展模式？

张信刚：我用“学者”这个词可能不够精确，我指的并不是数学家或者天文学家之类的学者，而是在伊斯兰地区普遍存在的一批被大家公认的教法学者。对于伊斯兰国家来说，要他们放弃一千多年来的信仰是很难的。凯末尔时代曾经有过尝试，但最终他自己也受不了。我觉得伊斯兰是那些已经伊斯兰化好多世纪的人的共同体，但并不是说他们必须局限于某一种教法的解释。就有如欧洲，在天主教拉丁教会的指引下曾经做过一系列教法的诠释，但是马丁·路德出现后，他对教法、圣经做出了新的诠释。假如在伊斯兰社会中能够出现一个像马丁·路德的人，那就合乎我刚才所说的“伊斯兰+科学”。我所用的“民主”，只是概念上的“德先生”，并不是指具体使用何种选举方式的“德先生”，因为民主本身就没有精确的认定标准。因此伊朗、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他们将来发展出的政治制度肯定有所不同，肯定是符合他们自己的现实。

听众提问：区域研究对丝绸之路的发展有哪些促进作用？区域研究包括什么？

学术要为政治服务，区域研究从学术角度来看如何给广大学者提供方向和引领？

张信刚：区域研究是培养人才的方法，对此我是肯定的，但区域研究并不是一种铸造人才的“模具”，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另外，学术从历史上看往往是可以为社会福利、政治统治服务，但如果做学术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某一种特定目的服务，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编辑：兰旻

审稿：翟崑

终审：钱乘旦